



新闻 人生

名记者清华演讲选

李彬 常江 编

新闻人生 ——名记者清华演讲选

李彬 常江 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本中国名记者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演讲精选录。这些演讲内容丰富,思想鲜活,叙事生动,有声有色。阅读本书不仅可以直观了解中国新闻人及其精神风貌,把握新闻与社会的有机联系,而且还能得到人生的启迪。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9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闻人生——名记者清华演讲选/李彬,常江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302-18829-2

I. 新… II. ①李… ②常… III. 演讲—中国—当代—选集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8760 号

责任编辑:纪海虹

封面设计:傅瑞学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

装 订 者: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3×235 印 张:17.5 字 数:316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定 价: .00 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

序言

范敬宜

《新闻人生——名记者清华演讲选》的编者把这部书的清样交给我并嘱我作序，已经半年多了，直到今天才拿起笔来，实在是我的苦衷。忙与懒固然是原因，但并非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面对这样一大部丰富精彩的讲稿，我突然觉得自己非常渺小，难以承担这个重任。说句实在话，在过去十多年里，我曾经为几十位新闻工作者（包括非常著名的记者）的著作写过书序，但是像今天这样“发怵”，还确实是第一次。

作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我首先要代表全体师生向所有为我们的系列讲座授过课的名记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是你们，把一缕缕清风送进了清华园，把一场场春雨润进了清华学子求知若渴的心田；同时给学术氛围本来就浓厚的清华园注入了更加新鲜芳香的空气。这种精神营养在莘莘学子身上将会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恐怕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完全预计的。

近几年来，我国新闻界出版了许多名记者的论文集，特别是总结他们新闻生涯经验的访谈录，展示了他们新闻实践和新闻研究的丰硕成果。而《新闻人生——名记者清华演讲选》这部书，在林林总总的同类著作中，仍然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一是“真”，保持了讲授者的“原汁原味”，不修饰加工，没有虚话、套话。二是“实”，全部是本人的亲身经历和实践，实实在在，非常真切。三是“细”，细致入微地讲出了本人策划、采访、写作、修改的具体“过程”及其细节。四是“神”，透过对自身新闻实践的叙说，活生生地反映了本人的精神面貌、精神世界。把这几个特色综合起来，其效果是使读者感受到每一篇都令人可信、可学、可敬。如果从长远看，这些讲座带给同学的不仅是新闻工作的本质，更重要的是教给

他们如何做人，特别是做一名合格的、优秀的、时代需要的新型新闻工作者。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创办伊始，就把培养新时代“新闻高手”的目标明确地写在自己的“宣言”上。新闻高手，当然首先是优秀的名记者。那么，名记者如何培养？要靠课堂教学，要靠社会实践，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当代的名记者请到清华来，有计划、有步骤地举办系列讲座。事实证明，以清华大学的声望和影响，我们完全有条件、有优势办好第一流的讲座。在新闻与传播学院内，我们拥有一支知识渊博、学贯中西、既有经验又富朝气的教师队伍，如果和校外的优秀新闻人才会合起来，相辅相成，就会使我们新闻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得到更加紧密的结合，从而迈上更高的台阶。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讲座曾经给我留下过深深的烙印。还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听过两次终身难忘的新闻讲座。一次是鼎鼎大名的报人徐铸成讲新闻工作者如何积累知识、积累资料；一次是《大公报》“四大才子”之一刘克林讲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写作特色，当时他才28岁，讲得所有的同学少年个个热血沸腾。如果说徐铸成教给我的是新闻记者的某种基本功，那么刘克林给予我的是新闻记者的革命品格，从而鼓舞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走上了新闻工作的道路。名记者对青年学子的影响可以如此巨大，实在难以想象。今天，我们各方面的条件比那时好得多，比起前人，当代的名记者具有更大的优势，名记者在清华播下的种子，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涌现出一批批从清华园走出的名记者。

因此，我真诚地希望名记者讲座能一期期办下去，而且越办越好；也希望《新闻人生——名记者清华演讲选》一卷卷出下去，而且越出越棒！

2003年3月10日深夜

目录

1 范敬宜：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

我认为有五种人不可以做记者：不热爱新闻工作的不可以，怕吃苦的不可以，畏风险的不可以，慕浮华的不可以，无悟性的不可以。只有热爱新闻工作，你才能心甘情愿地去吃苦。新闻事业充满风险，但值得去为之奋斗终生。

9 何平：如何成为好记者

有三个石匠，人们问他们“你的志向是什么”，三个石匠都有各自的回答。第一个石匠说是为了养家糊口；第二个石匠说是把石头做得精美，成为一个出色的石匠；第三个石匠说是造一座美丽的、宏伟的宫殿。这个例子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将石匠作为谋生的职业，跟新闻工作相比，就是把记者仅仅当作一种谋生手段，仅仅是为了生存。第二个石匠想做一个出色的石匠，但是仅仅局限于把石头打造得精美一些，就像记者把稿子写得漂亮一些，虽然也有一定追求，但境界还不够。第三个石匠的回答才算有志向、有理想、有追求，他超越了职业本身的含义，而是按照自己心里的追求和理想去实现一种梦想。

25 张严平：心中有爱有阳光

有同学问我：记者这个职业最吸引你的是什么？我想，每个记者肯定都有自己的燃烧点，而对于我，记者这个职业最让我神往、让我一直停不下脚步的是它让我有机会走进一个又一个优秀的、高尚的、平凡而伟大的心灵。正是这样一颗颗心灵，让我领悟着生命的意义，感受着民族的灵魂。我写出他们，不仅让更多的人因为他们而感动和受到激励，同时，我的生命也在他们的心灵中得到丰厚的滋养。一个内心有阳光的人，才能感受我们社会的阳光；一个内心有阳光的记者，才能传达出蕴

于千千万万人心中的阳光。深深地感恩记者这一份工作,它让我领悟了太多人生的意义;它让我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始终朝向前进的方向;它让我内心始终充满热爱与阳光……

49 解国记:为文但求一句新

《新闻出版报》称赞他“敢为人民鼓与呼”,《南方周末》以“一个为民请命的记者”为题对他进行整版报道,农民称他是“解青天”,某省则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而解国记说自己只是个平凡的人。然而,能从平凡中发现精彩的,必有不平凡的才情。

73 黎信:为做记者先做人

1965年投身国际报道,4年多亲历中东乱局。他曾采访过卡扎菲,也曾参加过奥申委。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中,他坚守的是对国家、对人民的那一份深情。黎信说,他只是一颗螺丝钉,在新华社一拧就是37年。

93 杨兆麟:记者是一辈子的事业

他1944年参加革命,曾是新华社重庆分社惟一的编辑,也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台长;他曾在“梅园新村”参与报道国共和谈,也曾建国前夕参加接管国民党电台。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他豪情不减,因为:人生八十才开始……

107 杨正泉:毛主席逝世报道后面的故事

方明播完第一段后就暂停一下。看着划好的时间,几秒过去后,我一举手,他又开始播第二段。我的腿在打哆嗦啊,真害怕会出现什么差错。因为在试播的过程中,方明好几次把“毛主席永垂不朽”播成了“毛主席万岁”,我真担心他在这里又播成“毛主席万岁”。

121 罗开富:经历是最大的财富

他曾用368个日日夜夜沿着中央红军长征的原路徒步采访,每天平均行走70里路,每天写一篇报道和一篇日记。他是红军长征之后第一个重走长征路的中国记者。他的见闻里让人落泪的是那份真情。

137 詹国枢:我的记者之路

共和国同龄人、老三届、范长江新闻奖得主、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

大把让别人过目难忘的头衔对詹国枢自己来说比不上一件事：门一关，纸一铺，笔一提。繁华皆是梦，我自游太虚。要是写出了好文章，詹国枢一乐：俩字儿，兴奋！

151 敬一丹：把镜头当成熟人

课堂上的敬一丹笑容如阳光般灿烂。从只会念稿不会采写的电台播音员到北京广播学院的教师，再到集采编播于一身的知名主持人和新闻人，敬一丹经历着一再的柳暗花明。回望来路，她说：“我骨子里是干记者的。”

175 徐泓：在“游学”中成长

得新闻奖的作品是一边和人聊天一边写出来的；别人用完就丢的采访笔记却是她最珍视的东西。她随手将生活如一本大书般展开，告诉你如何徜徉其中，一边“游学”，一边成长。

193 谢玺璋：为大众文化辩护

曾经为古代文论做过三箱卡片的谢玺璋今天在评判流行文化，曾经那么让他感动的古典文学如今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愿听。他苦恼过、迷茫过，不知道怎样在巨大的心理落差间找到平衡。是俯视大众，还是融于大众？谢玺璋告诉你：文化记者在智者和俗人之间。

211 郭梅尼：要有一双时代的慧眼

18岁投身新闻事业时，她曾经半年登不出一篇稿，多年以后却获得第一届范长江新闻奖。靠自学物理采访钱三强的郭梅尼，使张海迪的形象深入人心的郭梅尼，她的秘密在哪里？在于她有一双慧眼，可以穿越时代的经纬，可以进入心灵的深处。

227 梁衡：哲人者，宁可舍其事而成其心

不读他的散文随笔，不算认识梁衡；不读他的科普文章，不算认识梁衡；不读他的学术著作，还是不算认识梁衡。记者梁衡？文人梁衡？学者梁衡？人们糊涂了，他却笑一笑，送一首自家小诗：“能工作时就工作，不能工作时就写作。二者皆不能，读书积累思索。”

249 翟惠生：大记者与大视野

国庆节的时候，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次《长征组歌》的重排，中间穿插有

朗诵。田华、陈铎、殷之光等“大演员”走上台的时候，不拿麦克风，那个声音都是气贯山河，给人一种震撼力，一下就能抓住观众的心。可现在一些青年演员和他们同台竞技的时候，显得那么软弱，那么无力。他们就是嘶哑着声音，拿着麦克风，也出不来那种底蕴。这就是大与小的区别。

267 编后记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院长、教授

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

演讲人简介: 范敬宜,江苏苏州人。早年求学于“无锡国专”,1951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中文系,同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曾任《东北日报》和《辽宁日报》编辑。1983年,任《辽宁日报》副总编辑。1984年,调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1986年,任《经济日报》总编辑。1993年,任《人民日报》总编辑。1998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与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2年,受聘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兼任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武汉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博士生导师等。代表作有《总编辑手记》、《敬宜笔记》等。

编者按：2002年4月21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正式成立，原《人民日报》总编辑、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范敬宜受聘担任首任院长。2001年6月，范敬宜教授在清华大学第一个新闻学本科班即“新闻9班”开办仪式上作了这次演讲。

范敬宜通过自己的经历，深入浅出地论述了做一个记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热爱新闻事业、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良好的工作作风。当天，听课的同学在“水木清华 BBS”上称赞范敬宜“风趣的谈吐，真挚的爱心”，是一位“可爱的长者”。从此，“如有来生，还做记者”便成为清华新闻学子的一句座右铭。

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

我对新闻工作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情结。我小时候生活在上海一个叫静园的地方，10岁就开始自写自编，出了一份手抄的《静园新闻报》，版式是学《申报》和《大公报》。所以我工作以后，不用学就会画版——不到10岁我就会了。我把我家左邻右舍的事情都写下来，然后偷偷把小报塞进邻居的门缝里。邻居们很奇怪：“谁把我家的隐私写下来了？”我们家邻居有一个姓王的，为外国通讯社做记者，晚上回来的时候，经常在家门外偷偷吃一碗馄饨，边吃边东张西望，生怕别人发现。我就给他发了个头条——《王大胖背儿女偷吃馄饨》，结果惹了一场风波。

我1951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那时候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领袖，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每当我读到这儿，总是热血沸腾，我要做魏巍，我要去白山黑水。于是我舍弃了去华东师大当助教的机会，对家里撒谎说我要去北京工作，然后就坐上火车直奔东北，成了《东北日报》（后改名《辽宁日报》）的记者。

可是，记者没做几年，1957年的时候，我被打成了右派。在“文革”期间，我又被下放到全国最贫困的朝阳山区。我想也许这辈子是再也做不成记者了，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一个工厂或农场里做黑板报的编辑。

1975年我们去大寨学习，回来时经过北京，在郊外住一个晚上。我跑了好远的路去王府井人民日报社看我的同学。等我晚上到了人民日报社，门卫告诉我今天是星期天，进不去。我在农村那么多年，哪还有什么“星期天”的概念。那天晚上，我就在人民日报社门口的报栏前徘徊了一夜，把那天的报纸从头至尾看了个遍。那天是

10月5日，我记得清清楚楚。望着人民日报社楼上影影绰绰上夜班的人们，我心想：“在这里面工作的人是多么幸福啊，可惜我永远不会有这种幸福了。”戏剧性的是，18年后我成了《人民日报》总编辑。

我现在不在职了，可每天都要写东西。因为我离不开新闻，新闻是一种最具有魅力的职业。如果有人问我：做新闻工作最基本的政治素质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就是对党的新闻事业的深沉的热爱。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做记者，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每写一个报道，做一个版，一个节目，都要考虑社会效果。“这样报道对社会是有好处，还是有坏处？是积极效果，还是消极效果？”这听起来似乎是老生常谈，但要做到很不容易。我在当总编辑的过程中，在这个问题上要对年轻同志费很多唇舌。我对他们讲，不能只看到一个表面现象，拿过来就写。实际上你只了解了一面，没有了解另一面。即使事实是准确的，也不一定是应该传播的，要考虑社会效果。很多年轻同志在学校里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了解西方新闻学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区别，进报社后不得不“回炉”学习。你们应该在学校里就解决好这个问题。

西方新闻学老讲新闻自由。新闻自由这个概念是中性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我们不反对新闻自由，只是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的新闻事业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有一次，一个美国新闻团来人民日报社，走时有个人看见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社的照片，问我：“江泽民主席来说什么？”

我说：“要求我们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

他傲慢地说：“任何国家的领袖都会这样要求报纸，可是我们总是朝相反的方向去做。”

他要说明他们办报有自由。我说：“你可能不必听克林顿的，但你敢不听你们董事长的吗？”

他耸耸肩膀笑了。

我到韩国访问时，一位报纸总编辑陪我去见韩国总理。在总理面前，这位总编辑跷着腿，表现得很傲慢。但当天晚上他的董事长来了，他立刻站在一旁，毕恭毕敬的。董事长因为对当天的报纸不满意，把报纸“刷”的一声扔给他，他也是点头哈腰的。

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这世上的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框框里面，比如说房子就是一个限制，如果不要这个“框框”，那只有冻死。我们的新闻有我们的要求，但这并

不能限制新闻工作者的创造性。就算有框子,也要提高水平,提高了水平,照样能很好地发挥。京剧大师盖叫天的武功高超,到了晚年,仍可以在一张八仙桌底下打完一套猴拳而碰不到桌子腿,这说明技艺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我对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也有个认识过程。第一阶段是在《辽宁日报》当副总编辑。那时候我对总编的理解是:“总编总编,总是在编”,就是说要身体力行,我要求编辑记者做到的,我首先要做到。比如提倡写“好而短”的新闻,我就做样子,把本来可以写成五六千字的,写成五六百字。

第二阶段是在《经济日报》当总编辑。那时候认为总编辑的主要任务是出好点子。而且,光靠一个人,甚至光靠编委会那几个“头头”,是出不来多少好点子的,要把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才能有用不完的点子。所以那时候北京新闻界有个说法,是“《人民日报》的牌子,《经济日报》的点子”。对此我很得意。

但做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第三阶段,我到了人民日报社后,才意识到老总最重要的素质是把握导向,把握“度”。这就像一个船长,当风平浪静的时候,你可以优哉游哉,但一旦海浪翻涌,你就要掌好舵,否则也许会全军覆没。这时你再能带头写稿子,再能发动大家想点子,也不管用了。

江总书记曾说过:“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这句话的分量很重。没有经历过前面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很难理解,我听了这话之后,感觉特别正确。

不了解大局的记者,只是一个文字匠

怎样才能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呢?

首先是要了解大局。我们倡导“政治家办报”,那么政治家的特点是什么?是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从而作出正确判断。诸葛亮祠堂前有副对联,里面有这样的话:“不审时则宽严皆误”。就是说,不了解形势是做不出正确决断的。大局不是一成不变的,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左”的思想束缚着人们的头脑,那时我们大力宣传思想解放一些,胆子大一些,步子快一些。后来,思想解放有些出格了,就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思想僵化的苗头,改革开放一度停滞不前,小平同志南巡,重新提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这比80年代初的“解放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掌握不好,就会犯导向错误。而不了解大局的记者,只能是一个文字匠。

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村报道就是唱“四季歌”:春种、夏锄、秋收、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1982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去农村了解“夏锄”情况。去了两天以后发现,上午10点来钟的时候,田野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而在承包以

前当时的报道都是“红旗招展，人欢马叫”。实际上那时大家磨洋工，不出活，反正是吃“大锅饭”，“干不干，一毛半”，一天就挣一毛五的工分。

为什么现在地里没有人了呢？在承包以前，人们都是八九点才出工，而现在包产到户了，人们早上四点就出工，等天大亮时已经收工回家了。以前认为带来活力的是“红旗飘飘，人山人海”，而现在却正相反。如果不了解大局，不了解以前的状况，就抓不住这个有时代特点的好新闻。我就此写了一篇四五百字的短新闻《田野静悄悄地静苗情好》，结尾是这样写的：“当我们经过一个村子时，看见四五个妇女背着锄头急匆匆地从地里赶回来，一边走一边说：‘快点，还来得及听《隋唐》呢。’”

这篇报道得了一个奖，可我也为此牺牲了一条腿。我急急忙忙地提前赶回报社交稿，中途火车颠覆，一条腿粉碎性骨折。

也是那一年，我到辽宁康平县两家子公社采访。宣传部的干事陪我到了公社办公室，一看那儿破破烂烂的，炕上的席子黑得看不出是什么做的，被子脏得像抹布一样。公社秘书一看我们去了很高兴，说：“你们就住这个炕上，帮我接电话，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回家看看。”

我们在那儿一住几天没发现什么新闻线索，到了第三天睡觉醒过来，我问那个干事：“你发现什么没有？”

他说：“没有。”

我说：“我可发现大新闻了。这三天，我们接到过一个电话没有？有一个来上访的没有？一个也没有。这就是大新闻。”

我知道，像这样的穷困乡，在过去晚上电话很忙，不是大搞形式主义，催进度、要报表，就是上访、吵架。越穷的地方越出问题，邻里之间为了一个鸡蛋也会打起来。这个说“我家的鸡下蛋下到你们家了”，那个说“没有”。好，那就打架。有一个地方为这种事出了三条人命。

我们找来了公社老秘书，问他以前的情况。他说以前根本睡不着觉，电话不断，只好把电话放到枕头边上。早上老百姓一大早就来“堵被窝”，上访，要饭吃，哪能像现在这样睡得安安稳稳。承包以后，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事情就少了。

我于是写了一篇400字的报道《夜无电话声 早无堵门人 两家子公社干部睡上了安稳觉》。那位干事对我说：“你这篇新闻是睡出来的。”为什么能“睡”出来，就因为脑子里有农村的大局。

将来同学们做记者，要学习很多的东西，但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大局，知道中央在干什么？最近刚刚开完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讲的什么？全国科技大会的主要精神是什么？我最讨厌别人说：“我不看报”，你不看报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你不看报怎么了解大事，怎么了解大局？

要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但现在这种传统受到了冲击。我们提倡生动活泼的文风,但现在的新闻炒作、夸大,有很多的痞子味、流氓气。很多的人想采访我,但我一个也不接受。为什么?我怕!以前有人写我,说我“潇洒”,我像土豆一样,有什么“潇洒”?有人在文中描写我“沉思”,“向窗外看了一下”,我不会“沉思”,也没向窗外看。

有些报道夸大到荒谬的地步。以前有些报纸联合采访优秀法官谭彦。有的写:“一辆救护车呜呜叫着,从法院里开出来。路上的行人停下脚步,担心地说,恐怕是我们的谭法官又病了。”真是胡说八道。还有的说他“肺部烂得像蜘蛛网一样”,一点医学常识都没有,人要那样还能活吗?还有的说他身体虚弱,“办公室在5楼,他每天上班就像爬万里长城一样。”那可见了鬼了,每天都要爬万里长城?如果真是那样,那他的领导也太不是人了,就不能给他调换到一楼来?

有一次,爱泼斯坦特别气愤地问我:“老范,写报告文学能虚构吗?”

我说:“不能吧。”

他告诉我,有一个记者采访他,写了一篇《爱泼斯坦的爱情生活》,3000来字,错了25处。“他说我结婚,宋庆龄来证婚。真是见鬼,造谣造到宋庆龄头上了。”

现在报纸上有很多不真实的东西,任意粉饰、拔高,想象还说是“合理想象”。

我自己也有教训。1956年辽宁省举办一次文艺汇演,省委宣传部的领导说瓦房店纺织厂的歌咏队不错,让我去采访一下。当时时间来不及了,无法去现场采访,他便让我去找歌咏队的队长。那位队长能说会道,说什么“我们车间里到处能听到歌声”。我就写了一篇稿子《车间处处闻歌声》。

很快那个纺织厂的群众就来信举报,说这篇报道的作者根本在胡编,第一,他没来厂里采访;第二,车间里根本不允许唱歌,那样是违反劳动纪律的。那时我刚刚被评为一等先进工作者,马上就被取消了资格。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教训,后来写稿件,一点也不敢马虎。

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

为什么说“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因为基层是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我1969年插队落户,去了一个非常穷困的山村。我问那儿的老队长:“这么个穷地方,怎么才能变化?”

老队长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大包干。”

我当时大吃一惊，心说这个人觉悟怎么这么低。当时正猛批“三自一包”，大讲阶级斗争。我对那个公社社长说：“这儿的人思想觉悟很低，要好好教育。”社长只是笑了笑，什么也不说。

可十年以后，事实证明，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是那个不识几个字的老农民！因为农民是第一线的实践者。历史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这儿。

为什么要讲深入群众？因为不深入就不能了解真实的情况。现在的假话太多了，前年我还写了篇文章，叫《人到七十学听话》，你要不仔细听，就很难发现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

改革开放之初，报纸一窝蜂地报道农民富了，这个万元户，那个万元户，好像全国农村都是万元户，新华社驻黑龙江的一个记者写了篇文章，说要正确认识农民的富裕程度，要认识到有些农民确实富了，但有些农民还很穷。后来他的报道引起重视，被当作党中央的文件下发到各省。

作为记者，要抓住重大主题，牵动千万人的心，必须和实际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我经常对年轻人说，不能老盯着那0.2平方公里——我指的是王府井那一带，而要看到960万平方公里。很多年轻人家庭条件不错，进大学，进大报，他眼里看到的只是王府井。我还对他们讲，不要只看“紫房子”，也要看黄土地。“紫房子”是指北京最早的婚纱影楼。很多老百姓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要把眼光放到老百姓身上。

现在很多年轻人吃不得苦，缺少艰苦奋斗的精神。像“唐老鸭”（新华社摄影记者唐师曾）和吕岩松这样的优秀记者不多。现在的条件比过去优越，地方上知道你要来，提供给你最优越的条件，所以现在想深入都很难。我写了一首打油诗描写一些记者：

早辞宾馆彩云间，
百里方圆一日还，
群众声音听不着，
小车已过万重山。

如果不深入基层，就只会说些套话，什么“应该指出”、“众所周知”，什么“毋庸讳言”、“必须强调”，苍白无力却说得似乎理直气壮。

当年刚做记者时，我虽然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但认为自己文字不错，自视甚高，写文章很花哨。看完芭蕾舞演出，用力写了一篇报道。同事看了说：“范敬宜形容词可真多！”“擦粉太厚，未必是美。”把我气得哟。后来再回头干新闻工作时，就不一样了，因为我在基层呆了20多年。

1978年，我落实政策回到《辽宁日报》，人家谁也不要我。填工作证时，我什么身份也没有，连个助理编辑也不是。人事处长说：“就给你填个‘干部’吧。”我就拿这么

个“干部”身份去采访。当我写出我最重要的报道时,我什么身份也没有。当我后来什么身份都有了,连我自己都数不清有多少个身份时,却再也写不出有分量的报道了。

每个人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要把困难当作磨练。我认为有五种人不可以做记者:不热爱新闻工作的不可以,怕吃苦的不可以,畏风险的不可以,慕浮华的不可以,无悟性的不可以。只有热爱新闻工作,你才能心甘情愿地去吃苦。新闻事业充满风险,但值得去为之奋斗终生。

刘鉴强/记录整理

(2001年6月)